

# 佛陀跋陀共慧远构佛影台事再考

陈金华

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

《华严经》之初译者，鸠摩罗什(334-413)之劲敌，此固人所共知之佛陀跋陀(360-429)也。惜乎此等制式印象于其生涯之另类色彩实有淡化、湮灭之虞。谓予无征，请举二端：跋陀于5、6世纪禅定传统颇有贡献；跋陀协同慧远(346-416)移植中亚一佛影窟于中土，于佛教石窟建构有大影响。跋陀于禅定传统之贡献，另有拙文探讨<sup>①</sup>。本文仅限于其迁移造像之功绩。

佛陀跋陀据传乃迦毗罗卫国释迦族裔，于闐宾追随佛大先修习禅定<sup>②</sup>。嗣后，因同出师门之智严(305-427)盛请，启赴中土，于406或408年抵达长安<sup>③</sup>。史料称，后秦一代，三千余名高僧获姚兴(394-416年在位)供养。唯跋陀最精禅

① 参阅拙文“Meditation Tradition in the Fifth Century Northern China: Wit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a Forgotten ‘Kashmiri’ Meditation Tradition Brought to China by Buddhahadra (359-429)”，收入 *Buddhism Across Asia: Networks of Material,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Exchange* (eds. Tansen Sen, Peter Skilling, et al. Singapore: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, 2009)。

② 下文于跋陀生平之勾勒，据其两主传：《高僧传》(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34b27-335c14)与《出三藏记集》(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103b28-104a28)。同时参照《华严经传记》(《大正藏》卷51，页153c28-154c9)，《开元释教录》(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505c17-506c22)与《庐山记》(《大正藏》卷51，页1041b20-c16)之相关记载。

③ 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34b27-335a4；《出三藏记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103b28-103c16-17。《高僧传》和《出三藏记集》均未明言跋陀何时抵长安。后世史料，每有歧说。或弘始十年四月(408年5月11日至7月9日)(如《华严经传记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1，页154b6-7)，或弘始八年(相当于义熙二年[406年2月4日至407年1月24日])(如《佛祖历代通载》，《大正藏》卷49，页532b20-21；《释氏稽古略》，《大正藏》卷49，页786b23)。

定，而众僧纠缠于俗务。因教义与人格之分歧，跋陀僧团与罗什僧团间频生齟齬，终至矛盾激化。约410年，即其抵长安次年或第四年，跋陀被逐出长安，南指庐山<sup>①</sup>。随行弟子四十余众，如慧观(375?-445?)等<sup>②</sup>。慧远踵慕跋陀有年，欣其来依，求出禅经。跋陀于庐山盘桓年余求去。其间，慧远驰使飞书，欲解

① 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35a19-b12；《出三藏记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103c20-29）。徐文明君《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的一桩公案》（《中国哲学史》，2000年第三期，页101至110）于跋陀、玄高与法显诸疑案体深发微，新见迭出。徐君力证跋陀于414年初离开长安。其论证基于两前提。其一，跋陀于罗什圆寂之后离开长安；其二，确如僧肇(384-414)于追悼其师谏文中言，罗什亡于癸丑年（即后秦弘始15年或晋义熙9年）4月13日（即公元413年5月28日；见《鸠摩罗什法师谏并序》，《广弘明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2，页264b20-265b2〔罗什圆寂时间见264c18-19〕）。假设一基于慧皎两段记载：一，罗什殁后，慧观“南适荆州”（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68b1）；二，跋陀离长安时，有慧观等四十余弟子随行（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68b15：“于是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俱发”）。徐君此说似有欠周全处。首先，慧观于什亡后，南适荆州之说似难证成。慧观于什亡后方离长安，因慧皎未明言慧观自长安直奔荆州；相反，罗什死后，慧观随跋陀离长安，未径往荆州，而取道庐山，稍事盘桓。此外，于述及慧观游历荆州之前，慧皎提及罗什一预言（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68b13-15：“君小却当南游江汉之间，善以弘通为务”）（注：或以“君小，却当南游江汉之间”为断。误。小却，“不久”之谓也）。统观上下文，慧皎极力所言，无非：一如什所预言，于什亡后，慧观果真前往荆州（江汉之间指长江与汉水之间，与荆州大致重合）。果真如此，则难断言慧观（或跋陀）直至罗什故后方出长安。此外，414年跋陀于荆州与袁豹（373-413）相见（详下）。此与跋陀414年初方离长安之说相扞格，因豹歿于413年故。慧皎于此次会面之细节描述与其它史料多有吻合（此亦徐君所认可者）。准此，除非有确凿反证，此次会面应视为史实。因此，窃仍以为：410年或者411年初，跋陀携徒众出离长安，前往庐山；而据慧皎，跋陀于庐山盘桓岁余（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35b17）。因此，跋陀应在412年或413年初到达荆州。

② 慧观之死，慧皎仅略言：宋元嘉中卒，春秋七十有一（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68b25）。元嘉几达三十载（始于公元424年9月9日，终于454年2月13日），致使慧观之卒年漂浮于一宽泛之时段。所幸者，以下二史实可缩小此时段。元嘉二十年（即公元443年2月15日至444年2月4日），观以笔受之职协助求那跋陀罗（394-468）翻译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。见《历代三宝记》，《大正藏》卷49，页91a26-27；《开元释教录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528a9-10。443年或444年初，观尚健在，此固可知。再者，据传，观临终愿求宝云（376-449）接替道场寺任；宝云应允，然仅年余，便返六合寺，且于元嘉二十六年（即公元449年2月29日至450年1月28日）终老于此。见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40a10-14；《出三藏记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113a27-b1；《开元释教录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525c26-29。如此说可靠，观卒于元嘉二十五年（即公元448年1月22日至449年2月2日）前。换言之，观卒于443至448年间。取其中数，观约卒于445。其寿七十一，上推其生年则约为375年。

其摒事。似未果<sup>①</sup>。

离庐山，跋陀复往江陵（即荆州）。于荆州，与出自望族陈郡袁之名士袁豹（373-413）相过从，进而结识刘裕（363-422）（时任东晋太尉）。跋陀、袁豹相见似在412年或413年初<sup>②</sup>。413年或415年<sup>③</sup>，刘裕偕跋陀回京师扬州（即建康，今南京）。此后，跋陀汲汲于译事而不辍。最重要者当推《华严经》之初译。418年4月30日，于谢安（320-385）弟谢石（327-388）所建之道场寺（又称斗场寺），跋陀应请开译支法领（鼎盛年：392-418）获自于阗之部分《华严经》。参译者逾百，包括施主孟顗（?-418）与褚叔度（378-424）。初译于元熙二年六月十日（公元420年7月6日）成稿，惟校定本则晚至十八个月之后（永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〔公元422年2月5日〕）始告成。此即五十卷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（后又再分为六十卷）<sup>④</sup>。另有十二部译经归其名下。举其要者，有《摩诃僧祇律》（四十卷），《达摩多罗禅经》（两卷），新译《无量寿经》（两卷）及《观佛三昧海经》（十卷）（最后者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）<sup>⑤</sup>。

石窟与禅定之关联，学者每有措置<sup>⑥</sup>。论者以为，于那揭罗曷国（Nagarahāra，今阿富汗Jelālābād附近）佛影窟之神话，可获知推动石窟寺发展之丰沛生发

① 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35b12-17；《出三藏记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103c29-104a4。

② 此一时间，推定如下。据慧皎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35b20-29，跋陀拜谒袁豹时，值袁豹随裕至江陵，讨伐刘毅（?-412）。裕之伐毅，在412年与413年间（《资治通鉴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卷116，页3651及后）。

③ 据慧皎，平定刘毅后（413年初），裕邀跋陀往晋都，止道场寺（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35b28-29）。然于慧远传，慧皎又言，天司马休之（?-417）后，裕挈慧观回建康（义熙十一年八月〔公元415年9月20至10月18〕）（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68b17-19；宋武南伐休之，至江陵，与观相遇。倾心待接，依然若旧。因勅与西中郎游，即文帝也。俄而还京，止道场寺）。徐文明君（《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的一段公案》）认为，跋陀413年随裕回京，似不可能：因刘裕当时离荆，甚是低调。同时鉴于慧观于跋陀僧团中之地位，徐君认为，跋陀前往建康由慧观陪同，在415年，而非413年。此说可信。

④ 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35c3-9；《出三藏记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104，a19-24。此次译事之详细记载收《出三藏记集》之“出经后记”（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60c29-a8）。

⑤ 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35c11-13；《出三藏记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104a24-27。归为跋陀之译典，详《开元释教录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505b20-c16。

⑥ 刘慧达：《北魏石窟与禅》，《考古学报》3（1978），页337-352；贺世哲：《莫高窟北朝石窟与禅观》，《敦煌学辑刊》1（1980），页41-52；温玉成：《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93）；王书庆、杨富学：《敦煌莫高窟禅窟的历史变迁》，《中国禅学》4（2006）。

力。传说佛陀曾于那揭罗曷之佛影窟遗留圣影；该佛影窟成佛家朝圣之地，久负盛名，参拜者络绎于途，如中土之法显（334—420），道荣（五世纪）与玄奘（602—664）者流。

图状佛影之最经典者首推《观佛三昧经》之“观四威仪品”。该品详述释迦牟尼度化龙女与毒龙；龙类恳求世尊相与常住，以督导其不犯恶业。世尊允允，凭借神力，跃入石壁，留其影象<sup>①</sup>。该品并胪列观想“佛影”之次第。鉴于此一形象观想于中古石窟寺之发展至关紧要，兹录相关经文如次：

观佛影者，先观佛像，作文六想，结加<sup>②</sup>趺坐，数草为坐。请像<sup>③</sup>令坐，见坐了了。复当作想，作一石窟，高一丈八尺，深二十四步，清<sup>④</sup>白石想。此想成已，见坐佛像，住虚空中，足下雨花。复见行想（像？），入石窟中。入已，复令石窟作七宝山想。此想成已，复见佛像，踊入石壁。石壁无碍，犹如明镜。此想成已，如前还想三十二相。相相观之，即令明了。此想成已，见诸化佛，坐大宝花，结加趺坐，放身光明，普照一切。一一坐佛身毛孔中，而阿僧祇诸七宝幢。一一幢头，百千宝幡。幡极小者，纵广正等，如须弥山。此宝幡中，复有无数百千化佛。一一化佛，踊身皆入此石窟中佛影脐里。此想现时，如佛心说。如是观者，名为正观。<sup>⑤</sup>

影窟之记载于石窟修炼与石窟建构产生之最早、最突出之影响，在乎慧远

① 《观佛三昧经》，《大正藏》卷15，页679b7—81c。关于此故事之详细叙述，见Alexander C. Soper, “Aspects of Light Symbolism in Gandhāran Sculpture” (Part I), *Artibus Asiae* 12 (1949), 页279；日文之完译，见桑山正进，《カービシー＝ガンダーラ史研究》（东京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，1990年），页77—84。

② 显然“跏”误作“加”。

③ 另有版本“像”作“佛”，似更允当（《大正藏》卷15，页681，编者注15）。

④ 另有版本“清”作“青”（《大正藏》卷15，页681，编者注16）。

⑤ 《观佛三昧经》，《大正藏》卷15，页681b15—29。

于其常驻之大林寺所仿建之“佛影台”<sup>①</sup>。佛影台始建于义熙八年五月一日(公元412年5月27日),竣工于次年10月13日(义熙九年九月三日)<sup>②</sup>。

慧远之后,佛影窟神话续激扬中土佛教徒众之遐思,澎湃不绝。如梁僧佑

① 《高僧传》,《大正藏》卷50,页358b11-14:“会有西域道士,叙其光相,远乃背山临流,营筑龛室,妙算画工,淡彩图写,色疑积空,望似烟雾,晖相炳曜,若隐而显。”为慧远叙那揭罗易佛窟者,所谓一“西域道士”。慧远撰《佛影铭》,于异域人士其身份有所交代:闍宾禅师、南国律学道士(《广弘明集》,《大正藏》卷52,页198a10-11)。据汤用彤先生,此“闍宾禅师”即佛陀跋陀;参见汤著《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》,页246(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[1938年第一版])。Erik Zürcher与桑山正进均表支持(参见Zürcher, *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* [Leiden: Brill, 1972], 页224-225;桑山,《カービシー=ガンダーラ史研究》)。至于“南国律学道士”,志磐(?-1269)定为佛陀耶舍(《佛祖统纪》,《大正藏》卷49,页261b22-27;页261c10-15)。对此,汤先生未置可否,然汤先生断言此律学道士非法显。依据谢灵运(385-433)说法(见其《佛影铭并序》,《广弘明集》,《大正藏》卷52,页199b10-11:“法显道人至自祇洹,具说佛影,偏为灵奇”),文明君提出此佚名之律学道士即法显(334-420)。然令人费解者:法显本籍平阳(属今山西),何以称作来自“南国”?或谓南国指南朝,法显时在南方,又为汉人,自然自认为南国(南朝)之人。此亦不通。南北朝乃后人说法。东晋王朝及取而代之之宋、齐、梁、陈诸朝均以中华正朔自居,断不会自认为偏安一隅之南朝。于法显,慧远或有咨询佛影窟之事。然“南国律学道士”是否即法显,予难遽断。窃疑此“南国律学道士”亦一域外人士。果如此,“南国”应指南印度,一如“中国”或指“中印度”。此一用法于法显游记,即有案例:“法显发长安,六年到中印国,停经六年。”(《高僧法显传》,《大正藏》卷51,页866b17-18;“中印国”若干版本作“中国”[见《大正藏》卷51,页866,编者注27])。至于南国用如南天竺国,证例极伙。聊举三例,以概其余:

1. 《摩诃僧祇律》,《大正藏》卷51,页462a14-16:复次,佛住王舍城。尔时,阿闍世王未与毘舍离离车有怨。时南国商人持一段摩尼,来与王。

2. 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》,《大正藏》卷51,页696a15-17:时实力子与二苾刍,一名善友,二名大地。于生生中常为怨恶,从南国来,至王舍城。

3. 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,《大正藏》卷51,页5a24-b1:大觉寺西有迦毕试国寺,寺亦巨富,多诸硕德,普学小乘。北方僧来,亦住此寺,名婆摩折里多(唐云德行)。大觉东北两驿许,有寺名屈录迦。即是南方屈录迦国王昔所造也。寺虽贫素,而戒行清严。近者日军王复于故寺之侧,更造一寺,今始新成。南国僧来,多住于此。

如此,则“南天竺国”与“闍宾禅师”之“闍宾”可相应呼矣。

② 见《广弘明集》,《大正藏》,卷52,页198b5-8。徐文明(《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的一桩公案》)认为这项工程分两个阶段完成:先筑台,次年待慧远从跋陀和法显具闻其状,始画图作铭。

(445-518) 摘取相关情节编入其《释迦谱》<sup>①</sup>。至有论者以《观佛三昧经》影窟说话为云冈坐佛之典据<sup>②</sup>。

佛影神话于石窟寺之影响，鲜有学者置疑；然神话之由来，则聚讼纷纭。寔肇因于《观佛三昧经》起源之茫昧难明。该经虽称汉译，其语言与思想之繁复，后世学者多所体认。相应梵典，殆告阙如。本经帙巨义丰，亦非单一作者可只手草成于一时<sup>③</sup>。经文中涉及影窟部分乃跋陀编译，甚或杜撰。此为多数佛教学者与艺术史家所公认者。1990年，扶桑中亚学大师桑山正进氏其健达罗佛教史之扛鼎巨作面世。氏于此公案，再加详论。佛影窟说话出自跋陀之既有看法，再次确定<sup>④</sup>。

① 僧佑在《出三藏记集》中对此作有说明，所谓《观佛三昧经》即是《释迦留影在石记》的渊源（“释迦留影在石室记”，出《观佛三昧经》；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88a9）。节录见《释迦谱》卷3（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67c5-68a7）；原文见《观佛三昧经》，《大正藏》卷15，页680-81。如同Soper所指出的（“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,” *Artibus Asiae Supplement* 19 [1959], 191），这说明这则故事在僧祐时代尤为风靡。

② Soper, “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,” p.191.

③ 关于《观佛三昧经》起源和形成，有四种理论。第一，健达罗（Gandhāra）起源论，以小野玄妙和Alexander Soper为代表。小野玄妙（《健达罗的佛教美术》，京都：丙午出版社，1923年）注意到，经文中佛陀的体形特征及故事情节与健达罗艺术风格丝丝相扣，因此认定此经即出于健达罗。而Soper（“Aspects of Light Symbolism in Gandhāran Sculpture” [Part I], 页279）持同样看法，主要基于两个论据。其一，《观佛三昧经》特别强调佛盘坐洞中，如同佛影故事便是于此极力描绘。其二，此主题风行于健达罗与中亚艺术，而印度艺术于此不太注重。

对于此经与佛影故事的起源，另有研究观经类目（包括《观佛三昧经》）的学者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。一种认为起源于中国（这些学者注意经典中的中土色彩，其中包括月轮贤隆：《伪典的批判的研究》[京都：百华苑，1971年]）；一种认为起源于中亚（这类学者着意于经典的译者，许多观经的翻译者来自中亚，而中亚地区很容易受到健达罗思潮的影响；参见藤田宏达：《观无量寿经讲疏：「观经四帖疏」を参看して》[京都：真宗大谷派宗务所出版部]，页60-61）。

最后，汉译本结构的混乱使一些学者怀疑是否存在严整梵文原典。由此，他们认为，此经是编汇性的（乃是不同经典中禅观理论与方法的汇编）。据色井秀雄（《净土念佛源流考：大无量寿经とその周辺》[京都：百华苑，1978年]，页517-519），当前的版本是在原始经典（创作于中亚或印度）基础上不断增饰而成。此理论极致之发挥数山部能宜于1999年完成之耶鲁大学博士论文（*The Sūtra on the Ocean-like Samādhi of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uddha*）。山部认为，此经创作于中亚，其间不断有多种文化（印度、中亚以及中国）杂糅出新。

④ 通过精审的研究，桑山认为，这段对影窟的详细描述可能即跋陀所编排。作为此观点之基础，他一方面将跋陀看做是《观佛三昧经》译者（或编译者）；另一方面认为，在仿建那揭罗易佛影窟的工程中，跋陀充当慧远之顾问（见氏著《カービシー＝ガンダーラ史研究》）。

然日邦新锐山部能宣氏于此说提出异议。氏细勘《观佛三昧经》与玄奘等朝圣者于佛影窟之记载,发现重大歧异者众。氏因怀疑,《观佛三昧经》佛影窟描绘者无亲身观摩之经验。而跋陀为那揭罗曷之邦人,佛影窟于跋陀乃近在咫尺而闻名遐迩之佛家名胜。不亲历亲访之,不思议已极。氏主张,跋陀并非《观佛三昧经》佛影说话之始作俑者或叙述者。如此,氏所立论实赖于跋陀作为那揭罗曷邦人之身份,而此论又决定于跋陀出生地那呵利城(Naheli)是否即那揭罗曷(Nagarahāra)。那呵利城是否即是那揭罗曷,愚无力解答。唯跋陀传中一关键信息似为山部氏所忽略。该关键可颠覆跋陀亲访那揭罗曷佛影窟之假设。

跋陀主要传记资料中,《华严经传记》、《开元释教录》和《庐山记》关于其早年之记载与《高僧传》大略吻合<sup>①</sup>。以下仅引用《高僧传》记载,同时注明与其它三种数据之歧异:

佛陀跋陀,此云觉贤,本姓释氏,迦维罗卫人,甘露饭王之苗裔也。祖父达摩提婆,此云法天,尝商旅于北天竺,<sup>②</sup>因而居焉。父达摩修耶利,此云法日,少亡。贤三岁孤,与母居。五岁<sup>③</sup>复丧母,为外氏所养。从祖鸠婆利<sup>④</sup>闻其聪敏,兼悼其孤露,乃迎还,度为沙弥。至年十七,与同学数人,俱以习诵为业。<sup>⑤</sup>

其它传记数据,其叙述较略。例如《出三藏记集》表述如下:

① 《华严经传记》,《大正藏》卷51,页153c28-154a5;《开元释教录》,《大正藏》卷55,页505c17-24;《庐山记》,《大正藏》卷51,页1041b21-25。

② 《华严经传记》有一版本“北天竺”作“天竺”(《大正藏》卷51,页154a1)。

③ 据《华严经传记》一版本,跋陀“八岁丧母”(《华严经传记》,《大正藏》卷51,页154a2-3;然另一版本与《高僧传》记载相同,均作“五岁”而非“八岁”)。智升(鼎盛年:700-740)所记:与母居五年,复丧母(《开元释教录》,《大正藏》卷55,页505c20-21),可能以此为据。《高僧传》与《华严经传记》间此一歧异可能与“五岁”之歧义有关。“五岁”既可指“五年”,又可指“年齿五岁”。

另,《庐山记》(《大正藏》卷51,页1041, b22-23)之叙述颇为不同:跋陀三岁时先丧母,两年后再丧父。

④ 《华严经传记》(《大正藏》卷51,页154a3)与《开元释教录》(《大正藏》卷55,页505c21)作“鸠摩利”(而非“鸠婆利”),而《庐山记》(《大正藏》卷51,页1041b23)将两名混合,作“鸠摩婆利”。

⑤ 《高僧传》,《大正藏》卷50,页334b27-c4。

佛大<sup>①</sup>跋陀：齐<sup>②</sup>言佛贤，北天竺人也。五岁而孤，十七出家，与同学数人诵经。<sup>③</sup>

以上详略两种叙述，不同点主要有二。一、根据《高僧传》，五岁后十七岁前之某时，跋陀得以托庇于从祖；而《出三藏记集》则未提及其沦为孤儿后依怙于其从祖。二、据《高僧传》，受庇于从祖后，跋陀旋即度为沙弥；而《出三藏记集》则仅言跋陀十七出家，未言及此前是否做过沙弥。

如何解释这详略两种叙述的不同？前一叙述包含跋陀从祖之详细信息（包括其姓名，迎回跋陀之原因等）。尽管不见于后一叙述，此类细节必有所本。慧皎所提供之证据，需加斟酌。

如山部氏所言，所谓跋陀乃“迦维罗卫人”，言其族出迦维罗卫耳，非谓跋陀必为迦维罗卫人也。氏又指出，跋陀实出生于北印度之那呵利：《出三藏记集》

① 元、明版本“大”作“駄”。《出三藏记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14。

② 宋、元、明本皆作“晋”而非“齐”。见《出三藏记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103，编者注10。

③ 《出三藏记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5，页103b28-29。《名僧传》部分原文幸存于日僧宗性（1202-1278）之节录。其中有段类似的记述：

佛駄跋陀（或云浮头駄駄，梁言觉贤），北天竺人也。九岁失父母，为外家所养。年十七出家，师令诵经。（《名僧传钞》，存《正续藏经》）[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68-1970；以下简作“续藏经”]，卷77，页355a17-18]

宗性非直录《名僧传》，实有所节略。因此，《名僧传》与《高僧传》的记载大体一致也不无可能。

又一简化记载见于《纂灵记》。《纂灵记》由法藏二位门人以其师《华严经传记》为基础编纂而成。《纂灵记》已佚失，部分佚文被保存下来（关于《纂灵记》，详见拙著 *Philosopher, Practitioner, Politician: The Many Lives of Fazang [643-712]* [Series Sinica Leidensia 75, Leiden: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, 2007]，页23-24）。《纂灵记》跋陀传记保存于若干文献中，包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》（《大正藏》卷36，页113a1-26）、《华严经疏钞玄谈》（《续藏经》卷5，页831c21-832a18）与《华严感应缘起传》（《续藏经》卷77，页638a14-b11）。据澄观（738-839）征引，《纂灵记》于跋陀早年经历，叙述如下：

本姓释氏，迦维罗卫国人，甘露饭王之苗裔。觉贤三岁而孤，八岁丧母，为外氏所鞠。从祖鸠摩利闻其聪敏，乃度为沙弥。（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》，《大正藏》卷36，页113a2-4）

鉴于《纂灵记》与《华严经传记》之间关系，以上叙述或为《华严经传记》相关文字之简写（参见《大正藏》卷51，页153c28-154a4）。



以之为北印度人<sup>①</sup>，而《高僧传》则明言其生地是那呵利<sup>②</sup>。山部氏复考那呵利为那揭罗曷，因断跋陀为那揭罗曷人。氏似未及措意慧皎所提供一重要讯息：五岁沦为孤儿之后某时，跋陀被带回与从祖同住。其中深意，有待厘清。一者，跋陀从祖当时居住何地？设若其从祖未在那呵利，则跋陀五岁之后被带离那呵利。果真如此，须根据其当时年龄，以订正所谓跋陀为那呵利邦人之说法。二者，为其从祖领养之前，跋陀滞留那呵利若干年？易言之，离那呵利之时，跋陀年齿几何？

关于疑问者一，慧皎交代，跋陀的祖父作为商人，移居北印度（很可能是那呵利，跋陀之出生地）。其家族成员，包括其兄弟（跋陀之从祖），也可能随之定居那呵利。此假定成立与否，需考虑以下说法：父母相继去世后，跋陀为外氏所养。外氏者，无血亲者之谓也。此其从祖彼时未在那呵利之明证。从祖闻其聪明，将之“迎还”。跋陀与其从祖，山河阻隔所致者<sup>③</sup>。有鉴于此，跋陀祖父由迦维罗卫移居北印度之时，其部分家庭成员（至少其兄弟）当留居迦维罗卫。既如此，从祖当归迎跋陀于迦维罗卫。至少，跋陀归从从祖之时，已出离那呵利矣。

关于疑问者二，惜无方确考。惟可确定者：出离那呵利而与从祖共居时，跋陀尚未成年。理由至简：跋陀与从祖共居，尔后度为沙弥。再者，从祖得知其失却双亲而心生哀怜，遂将其迎还。此亦暗示，于得知侄孙之悲惨境地至将之迎回，从祖似未迟疑过久。

综合以上两点，可作以下推论。五岁或稍长时，跋陀被带离那呵利，前往异地（或即迦维罗卫），与从祖共住，并于彼处度为沙弥。十七岁之后，跋陀与几位沙弥同学一同唱诵经文，精进神速，其师叹为观止。<sup>④</sup> 慧皎复言，跋陀此后偕同学僧伽达多前往闍宾，从学佛大先。数年之后，受智严邀请，振锡中

① 《出三藏记集》，《大正藏》卷 50，页 103b28：北天竺人也。

② 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 50，页 334c17：有佛驮跋陀者，出生天竺那呵利〔梨〕城。

③ 此处，“迎”字殊堪玩味。除通常之“迎接”与“欢迎”（某人的回归）之义外，“迎”尚隐含某种必要之准备，以促成所强烈期盼之人或事之到来。现代汉语中“迎亲”或“迎娶”（准备欢迎新娘〔进入某一家庭〕）两词仍有“迎”字以上含义。在《高僧传》里，“迎还”一词也许暗示着，跋陀从祖当时与他相距甚远，要将他带回，不得不事先有所打点，考虑长途跋涉之辛劳。

④ 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 50，页 334c3-6。

土<sup>①</sup>。汉文史料中，罽宾谓克什米尔或犍达罗。两处或离那揭罗曷未远，然非一地，则可明言矣。

总之，纵然那呵利即那揭罗曷，跋陀亦仅以孩提未谙世事之时短暂居留那揭罗曷。很难据此断定其必有机会游访那揭罗曷佛影窟。

跋陀赴中土前亲身游历过那揭罗曷佛影窟，实无确证。既如此，因《观佛三昧经》佛影窟叙述与中土朝圣者之记载有偏差，而排除跋陀本人编撰该叙述之可能，此固于理未安矣。即便跋陀确为那揭罗曷邦人并亲瞻影窟，其仍有可能出于某些考虑而曲意雕琢增饰，以迎合其施主（尤其是慧远）之需求。还应考虑另一可能。汉土朝圣者以往，至跋陀之间，时隔数百年。其间，那揭罗曷佛影窟之周边环境绝无人力，自然破坏（如地震），此安可定言哉？

总之，《观佛三昧经》佛影窟部分乃佛陀跋陀编入，仍属可信。经文主体也或为跋陀编撰（后世窜入成分恐难排除）<sup>②</sup>。念及跋陀曾助慧远于庐山仿建那揭罗曷佛影窟之史实，此一看法更形合理。攸关于此者非惟关乎中土禅法经文之一，更有益于东亚禅定传统与中古佛教艺术卓有影响之诸多议题。

跋陀将来罽宾禅修传统（属说一切有部）其流风余绪，斑斑见诸史籍。五世纪禅修弘扬者与跋陀有瓜葛者为数非少。倡发岩窟禅修及石窟寺，乃跋陀僧团于五世纪北方禅定另一持巨大贡献。石窟与石窟寺一大用途在禅修。石窟寺历史可溯及跋陀抵长安之前者久矣。石窟寺于跋陀入华后，勃发而沛然莫之能御，此亦确然而不待辩者<sup>③</sup>。准乎此，跋陀之历史地位实有待再定。其移植中亚佛影窟于中土山岳之最为曼妙神秘者；而此山岳复因结缘于一卓越而富个人魅力之法师，一跃而成五世纪以降一佛门重镇。此罽宾传教士诒我中土者实远不止于其作为译经师之所为也。

① 《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页334c，7-20。

② 当然，可能也有后世窜入之部分。

③ 见注1。